



门阀士族 与永明文学

刘跃进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门阀士族 与永明文学

刘跃进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Our Academic Books
are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 / 刘跃进著. — 北京: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96.3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7-108-00897-1

I. 门… II. 刘… III. 永明体—诗歌史—南宋—文学研究
IV.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5570 号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彩虹印刷厂
版 次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张 12.25
字 数 270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刘跃进 1958年出生于吉林。
1981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任教于清华大学。1987年获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文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副教授。已发表论著《〈金瓶梅〉中商人形象透视》、译作《开发你的记忆潜能》及有关中国古典文献学、魏晋南北朝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学术委员会：

季羨林 李学勤
(主任)

李慎之 朱 虹

厉以宁 苏国勋

刘世德 赵一凡
(常务)

王 蒙

责任编辑：许医农

本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面向海内外学界，
专诚征集中国新进中青年学人的
优秀学术专著(含海外留学生)。

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学术与
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
奖掖继起人材，鼓励刻苦治学，
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
学术创新精神，
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
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本丛书由哈佛大学燕京学院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
保障作者版权权益。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
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
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
(原则上要求参选书稿高于一般博士论文水准)，
按年度评审遴选，
决出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
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

序

从唐代以来，当人们谈到六朝文学时，几乎无人使用“宋齐文学”的概念，而常把“晋宋”并称；也较少有人使用“梁陈文学”的提法，只是限于谈论“宫体诗”时，才把“梁陈”合为一谈。在绝大多数场合，人们总习惯于使用“齐梁文学”或“齐梁诗”的说法。在不少时候，“齐梁”几乎成了六朝的代名词。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大约和齐梁之际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大转折时代有关。这一点，当时的一些文学批评家和文学总集的编者们，已经有所认识。例如，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两大杰作——《文心雕龙》和《诗品》，都产生于这个时代；而现存最完整的文学总集《文选》，其成书年代亦与此相差不远。在短短的几十年中，接连着这三大名著，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更应注意的是，《诗品》所评论的作家，截至到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沈约逝世为止；《文心雕龙》论文学，着重评论自上古至刘宋的变迁，而对齐代文学只是在《时序篇》中空泛地说了几句颂扬帝王的话，其实是存而不论；《文选》的选录作品，基本上也只收录到沈约以前的作家为主，只有三个作家的六篇作品是例外。但这些作品中有五篇皆可考定为天监十二年以前所作；仅一篇尚难确定，但作于天监年间则无疑问（详见拙作《关于〈文选〉中六篇作品的写作年代》，载

《文学遗产》1996 年 2 期)。

不管钟嵘和萧统的以天监十二年为断限也好,刘勰的以宋末为断限也好,他们总是把南齐的“永明体”创始人王融、谢朓和沈约的出现作为文风转变的标志。所不同的只是钟、萧把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刘则认为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不管刘勰、钟嵘和萧统的文学观有什么不同,但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对文学史上这个大转变时期作出总结和提出各自不同的看法。从历史上看,每一个转折时代的大作家,都大抵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他们往往既是前一个时代集大成者;又是后一个时代的开风气者。以谢朓、沈约为例,在他们的代表作中,既受了建安到鲍、谢诸家的深刻影响,也为唐人导夫先路;他们另一些作品,也开启后来“宫体诗”之端。近人骆鸿凯先生在《文选学》中,把班固、张衡、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等人和梁代的柳恽、吴均等对立起来,认为《文选》所录,“高文典册十之七,清辞秀句十之五,纤靡之音百不得一”(第 32 页)。“永明体”作家的诗文,在这里显然应属“清辞秀句”之列。《隋书·文学传序》是唐代官修之史,其论六朝文学时,对梁代天监以前作家都作了很高的评价,而对梁后期文学则加以严厉的指责。在这种影响下,唐代应进士科考试的人,无不以《文选》为典范,甚至乡学之中,也讲《文选》(见唐张𬸦《朝野金载》;到宋代还有“《文选》烂,秀才半”(见陆游《老学庵笔记》)之语。可见齐梁之际的文风,实际上影响到了千余年以来的文风。

所谓“齐梁之际”文风的代表人物,实即指南齐永明年间出现的文人集团,其中包括王融、谢朓、沈约;也包括另一些著名文人如范云、任昉和陆倕等。这些人物虽大部分死于梁代(只有王融死于永明十一年,谢朓死于齐末),但绝大多数都成名于南齐

永明年间，并曾入齐竟陵王萧子良的府邸，同为“竟陵八友”中的人物。这些文人所聚集的竟陵王“西邸”，即是永明政坛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在这里出入的除了文士之外，还有很多名僧。萧子良和这些名僧曾创梵呗新声于此。在这同时，名士周颙遂创“四声”之说，而沈约则很快地把这学说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去，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永明体”和“声病说”，后来流行了千年以上的“近体诗”，正是由此导发的。随着“声病说”的兴起，不但诗歌，连辞赋、骈文等等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光表现在讲求声律一个问题上，而是使诗、文和辞赋一变过去的典雅古奥之风，而逐步趋向平易和流畅。这种转变显然与《南史·王筠传》载沈约述谢朓语：“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是相合的。但谢朓此语，却又令人想起了《大子夜歌》的“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作为中原高门出身的谢朓在艺术趣味上竟和南方的“街陌讴谣”的观点相一致。再就音律问题而论，吴兴沈氏的沈约采用了汝南周氏的周颙所创的“四声”说，并以此指导创作。不但如此，历代所用的韵书，其源也多肇自沈约。正如清人牟应震所说：“四声之分，始于周颙，而切韵类谱实始于沈约，则今之所行即沈本也。”（《毛诗质疑》，齐鲁书社版页369）沈约所分的韵部，虽以当时朝廷中流行的语音——西晋的洛阳音为基础，事实上却已经夹杂了不少吴音。举例来说，在现在所见的《广韵》等韵书中，“西”字均归入“齐”韵；而在汉魏古诗中，它却与“真”、“文”、“寒”、“元”、“删”、“先”等通叶，并且直到刘宋袁淑的《效白马篇》中还是这样。然而在《神弦歌》等南朝民歌中，“西”字早已入了“齐”韵。这种从语音到艺术趣味的变化，到处都显示了当时中原士族与南方土著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但使地域的偏见趋向泯灭，也使原来的门第

观念发生了变化。以南方的士族而论，在陆机的《吴趋吟》中说：“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四姓”即朱、张、顾、陆四家，而吴兴沈氏则还算不了什么著姓，直到晋宋之际，还不过是一个“武力强宗”。但自从刘宋的沈林子、沈庆之等人显达之后，钟嵘在《诗品》中已把沈约和王融、谢朓，并称“贵公子孙”。这四字出于颍川钟氏的人手笔，更反映出人们观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所以“永明文学”的出现，不光是多种意识形态方面发展变化的共同结果，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变化造成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现实”应该包括很多内容，不能局限于前一段时间所仅仅着眼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我们在从多种社会因素来解释“永明文学”这一文学现象时，还必须紧密地联系到“永明文学”本身的特点，论述和阐明它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刘跃进同志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一书，就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这部专著的一大特色就是避免了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论述文学发展的原因时，只是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基础的原因而忽视种族、区域文化等等重要因素。在这部专著中论到永明文学产生的原因时，就紧紧地扣住所谓“竟陵八友”的活动。把他们的出现，和南北士族从隔阂到融合的过程联系起来，把他们和当时的政局、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目录学等等各种文化领域的变化联系起来。这就使他对社会存在的论述和关于文学发展本身的研究融为一体，毫无机械拼凑之感。更主要的则是从“竟陵八友”在学术、志趣和性格方面的相同或相似来论证这个集团出现的必然性。这样，对东晋南朝的“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的从隔阂到融合的过程以及原来的“士”、“庶”界线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升降变化作了深刻的分析。这种论述有很多是独到的新见，发前人所未发，使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的关

系有了更细致和深刻的认识。

但是刘跃进同志的研究并不到此为止，他进一步从“永明文学”的思想和艺术特点方面对“永明体”几位创始人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作了深入而全面的分析。例如：关于谢朓、沈约的诗歌，我们经常论到的往往是“大江流日夜”或“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和“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或“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等名句，而忽视了他们另一些作品。在本书中，则进一步论到了他们一些咏物诗，指出其“开拓诗歌题材的新领域”的贡献；还注意到了像沈约的杂言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作用。使人对这些作家的理解更为全面深刻，使人耳目一新。尤其可贵的是刘跃进同志对王融、谢朓和沈约的许多诗，在平仄声律方面作了细致的研究、分析，统计其入律之句和特殊律句的大量例子，指出两种句式的不同作用。特别有意义的是，根据他的统计，在三人中入律句最多的是谢朓，其次才是沈约和王融。这与我们经常想像的声律说的倡导者是沈约，其中合律句应以沈约为多的想法是大有区别的。

刘跃进同志所以能取得这许多成绩，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不但有比较深入和宽广的思路；而且能够刻苦地钻研历史文献，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的这许多独到之见，无不是建立在《永明文学系年》及对永明作家的大量作品进行逐字逐句的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得出的。因此言必有据，不作空谈，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和优点。

在谈到本书的这些特点时，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回忆起当年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先师 游泽承先生多次教诲我们要认真读书，掌握大量的原始材料；但同时，游先生还特别对我指出，光是记诵材料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新的思维方法，掌握

新的观点，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创新。这些教诲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使我感到愧疚的是四十多年来，由于某些客观的因素，再加上自己努力不够，在学术上并无所成，有负师训。我没有能做到的，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比我年轻的同志身上。前年，我为吴先宁同志的《北朝文学研究》一书作序时，曾引用了一句成语：“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是我衷心的祝愿。我们这一代人岁月蹉跎，没有能接好前一辈的班。现在的条件不同了，大量的新科学、新材料涌现在我们面前，跃进同志又具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加上他的刻苦努力而且富于春秋。正如荀子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功是完全可望的。对此我充满着信心！

曹道衡

一九九五年四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前　　言

公元二十五年，汉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从此，整个文化中心迁移，由西而东。与前汉相比，政治体制虽然一脉相承，但是学术文化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儒家文化定于一尊的局面开始瓦解，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士人阶层由此而迅速分化：尊孔读经者固然有之，而佞佛信道者也日益增多。一时期，或隐逸于山林，标榜高蹈；或寄身于翰墨，纵横扬厉；或混迹于魏阙，心在江湖；或脱略于行迹，声歌征逐。如此等等，标志着一代士风的巨大变化。其流风余韵，整整影响了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学术文化的发展；而唐代文化高潮的到来，又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汉、唐两大文化高峰之间，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真正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一般地描述这种文化变迁的轨迹，也许并非难事。但是，具体而微地阐释这种变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机缘，仅靠朝夕之功，或凭一、二部著作，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为此，我选定了两个长远的研究项目：一是“中古文学思潮”，一是“中古学术思潮”，目的就是想通过对若干专题的考察，试图回答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从一九八七年开始，我就着手作资料长编工作。我希望自己的所有论述都尽可能地以资料长编作为基础，求实、

求深、求细。这是我既定的学问目标。

《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是“中古文学思潮”的一个专题。

众所周知，永明诗歌是唐代近体诗发展的源头，理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但是由于传统的“诗教”说的影响，学术界对于这个时期文学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本书详细地考察了永明文学产生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以及“永明体”的确切内涵等，从而得出如下结论：

一、从古诗十九首到南朝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两次重要变化：第一、从乐府古辞到古诗十九首，以抒情方式的转变作为显著标志，说明文人诗歌已经逐渐摆脱了乐府诗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的特色；第二、从魏晋文学到南朝文学，随着文学观念的日益明确，抒情技巧的日益完善，文学创作活动已逐渐摆脱了经史附庸的地位而走向独立。经过这两次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基本态式已初步确立。这是永明文学得以发生的历史前提。

二、作为文人集团，“竟陵八友”在永明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所以能够形成并发挥重要影响，除了思想性格、文化素养等因素外，还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唯其如此，“竟陵八友”的文化活动，就其影响而言，已远远超出了文学创作本身的范围：第一、促进了南北士族走向真正融合；第二、推动了文化事业的繁荣；第三、引领土族命运的转折。这是永明文学得以发展的文化背景。

三、关于“永明体”问题：第一、从元嘉体到永明体的确立，以子夜吴歌为代表的南朝民歌在其间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第二、永明体的特征包括：句式渐趋于定型，以五言四句、八句为多；律句大量涌现，平仄相对的观念比较明确，但是还没有形成“粘”的

概念。此外，用韵由疏而密，押平声韵居多，押仄声韵很严，至于通韵，很多已经接近唐人，对仗方面追求自然与情理的完美的结合；第三、永明诗人以沈约、谢朓、王融为杰出代表，而三位诗人的贡献又各不相同。

从本书的题目中就可以看出，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受到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尝试从宗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门阀士族在推动近体诗发生、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平心而论，从种族、环境、时代等方面研究文学艺术的发展历史，十八世纪以来的学者早有精到的论述，自然已不再是什么新鲜提法。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却依然旧话重提，不免要生出几多感慨；感慨中不时还夹杂着少许滑稽的味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过于强调文学艺术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对于其他相关因素，诸如宗族与区域文化等却多所忽略。甚至，有时还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横加指责，不以为然。当然，嘲弄历史最终被历史所嘲弄。就中古文学研究而言，客观地巡视本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不能不承认，我们现在所做的研究工作，在很多方面，包括研究方法的更新，基本史料的辨析等，实际上并没有超出陈寅恪那一代学人所厘定的范围。尽管他们曾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尽管他们的著作曾受到过相当的冷遇，但是历史终究不会忘记他们。即使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问题，他们的著作仍不失最重要的参考价值。事实上，要想进一步推进中古文学研究的深入，就不能不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继续前进。这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时代的政治氛围的阐释，而是特别注重考察中古时期比较突出的宗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种种复杂现象，追踪蹑迹，探微抉奥，从整体上建构了宗族——文化批评的研究框架，给后来者开启了中古文化研究的不二法门。

从汉末到隋代，前后四百余年，门阀士族的地位屡有升降，他们对于文学艺术的影响，程度上自有浅深的差异，方式上也不尽相同。因此，各个专题的研究，角度自然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总的原则没有变化。目前，我正在从事《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的研究，比较强调文人集团的作用和学术风气的影响。我想把这一研究专题的下限伸延到初唐。这可以说是永明文学研究的继续。之后，再翻回魏晋，上溯东汉，对若干专题作深入研讨。希望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完成“中古文学思潮”的各个专题的研究工作。

有人说，写作永远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过程。“意翻空而易奇，言微实而难巧”。落到笔下，每每言不尽意。就永明文学的研究而言，不尽人意的地方还很多。好在我目前还在继续从事《中古文学思潮》《中古学术思潮》的资料收集及各个专题的研究工作，同时协助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编著多达百万字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但愿能对这些阙憾有所弥补。

一九九五年八月作者自识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目 录

序	曹道衡	1
前言		1

上 编 永明文学综论

导 论 从古诗十九首到南朝文学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态势的形成	3
第一节 抒情方式的转变	4
第二节 独立精神的寻求	11
第三节 向内收敛的倾向	22

第一章 从隔阂走向融合

——论竟陵八友及其在六朝文化史上的地位 ..	27
第一节 竟陵八友的形成及其性质	28
第二节 竟陵八友在永明年间的文化活动	39
第三节 竟陵八友的评价	51

第二章 调谐金石 思逐风云

——永明文学思潮概说	71
第一节 永明文学背景	71
第二节 永明诗歌创作	78
第三节 永明文学思想	92